

A stylized silhouette of a mountain range, likely Mount Fuji, with a white peak and a dark green body, set against a dark green background.

铃木卓郎 著 齐 协 译

A decorative bar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 consisting of a red horizontal bar above a green vertical bar with a white border.

日本警察的秘密

A purple circular emblem with a laurel wreath border, partially overlapping the title text.

群 众 出 版 社

日本警察的秘密

铃木卓郎 著
齐 协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日本警察的秘密

铃木卓郎 著

齐 协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5千字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148 定价：0.58元

印数：00001——70000册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世界第一”	
——在光荣的背后	(7)
“世界第一”的日本警察	(7)
美国——“患病的大国”	(12)
“繁华的巴黎”——犯罪的城市	(18)
“不民主”的法国警察	(21)
准战争状态下的汉城警察局	(27)
无与伦比的交通安全	(32)
日本警察的阴暗面	(36)
班房里的秘密	(39)
对违反选举法进行的奇怪搜查	(43)
第二章 神秘的公安警察	
——最强大的情报机构	(46)
逮捕苏联间谍的壮举	(46)
直至地球的内侧	(51)
不象间谍的间谍	(54)
反共教育的秘诀	(57)
同共产党的纠纷	(61)
警察容许过激派自由活动吗	(66)
公安警察无所不晓	(71)

第三章 反恐怖作战

——发达国家首脑会议

- 的警备体制内幕…………… (78)
- 福特访日时的警备…………… (78)
- 保安警察的诞生…………… (85)
- 保安警察的誓言和骄傲…………… (90)
- 不寻常的训练…………… (94)
- 机动队的副作用…………… (99)

第四章 同日趋凶恶的犯罪作斗争

——科学技术的威力…………… (106)

- 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巴黎总部…………… (106)
- 秘密的赤军派追踪队…………… (111)
- “他就是犯人”…………… (115)
- 经验和时代的差距…………… (118)
- 暴力团为什么消灭不了…………… (123)

第五章 日本警察的头面人物

——警视总监列传…………… (129)

- 警视厅新大楼…………… (129)
- 重建警视厅的困难…………… (138)
- 在六〇年安保斗争中下台的小仓谦…………… (140)
- 警卫米高扬的原文兵卫…………… (143)
- 破例当总监的秦野章…………… (144)
- 同美浓部进行冷战的 本多丕道…………… (146)
- 庆祝警视厅创建百年的横野勇…………… (149)
- 遭难的土田国保…………… (152)
- 从国岛到今泉…………… (155)

第六章 庞大的“金字塔”

——警察厅及其制度、

人事和预算…………… (159)

日本警察的总司令部…………… (159)

长官至高无上…………… (168)

神秘的电话…………… (174)

国家公安委员长秘录…………… (178)

尖子的群像…………… (188)

本部长离职后的归宿…………… (193)

关于增加警察的争论…………… (197)

第七章 战斗在基层的人们

——不分昼夜进行战斗…………… (203)

署长的一天…………… (203)

年轻警察是定时炸弹吗…………… (209)

防止违法行为的教范…………… (212)

怎样争取当警察…………… (214)

巡警的一天…………… (219)

警察行列中的妇女…………… (225)

结束语…………… (228)

序 言

我在作新闻记者之前，对警察是一无所知的。我是一个反对官僚统治的普通学生，与警察毫无关系。

我从中学时代起，就产生了一种想当新闻记者的模糊不清的念头，随着升入大学，我的这种念头变得更加强烈。太平洋战争后期，即一九四四年七月，我接受了朝日新闻社的人事考试，结果被合格录用。在此之前的六月十五日，塞班岛的守备部队全军覆没；七月十八日，东条内阁由于战局恶化而辞职。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报纸受到新闻检查。不久，我作为最后一批学生兵不得不离开校园，奔赴战场。在战后混乱时期，即一九四七年八月，我才穿着复员军人服装进入朝日新闻社横滨分社，开始了记者生活。

我曾经请求说，当新闻记者可以，“只是别让我负责采访警察”。然而，在我三十年的记者生活中，大半部分时间是负责采访警察。对于这一点，我本人感到吃惊，也感到人生之路不可捉摸。

在我成为新闻记者之前，只进过一次警察署。第二次大战结束时，我身为少尉，根据波茨坦公告复员后不久，便收到了占领军司令部的通知：把带回来的军刀交给附近的警察署。在此以前，我甚至没有和警察谈过话。然而，当了新闻记者后，同警察密切交往、探听消息，却成了我每天的工

作。不出所料，警察都是些可怕的人，令人讨厌。但是，搞采访却不容许带有这种私人情绪。

三十年过去了，我在警察中结交的亲朋密友，多于我在报社结交的亲朋密友；我对警察的了解，比对报社的了解更深，这真有点奇怪。在我年轻时，具有一般人常有的那种左倾思想，甚至具有一种反对警察的情绪。现在，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仍能以批评的态度对警察进行在任何大学和图书馆中都无法开展的重要研究。

警察以现实的态度监视着现实社会的背面，执行着法律。但是，执行法律与我不相干，能够采访到只有警察知道的社会情况倒是我意外的收获；而且，我可以从至近的距离观察左右警察的人事关系和内幕情况。从远处眺望警察和在近处观察警察，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三十年来，通过同我年轻时认为“讨厌”的警察进行接触——尽管和我打交道的人换了很多——使我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感到，简单地以喜欢或是讨厌的态度来看待权力机构是不合适的；按意识形态的模式来评论警察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不想陷入以公安当局的立场去考虑问题的心情一直是强烈的。而且，从一个新闻记者的立场出发，总想与警察保持着一定距离。

可以认为，日本的许多评论家对警察是无知的，是抱有偏见的。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地了解警察的缘故。警察机构，不管在什么社会制度的国家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警察总是置身于危险之中。如果警察存在着国民认为予以批评的缺点，那么，警察就应根据国民的建设性意见加以改进。这是因为，权力机构总是包含着腐败的因素。

世人都根据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对警察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相应地对警察也有意见——其中有赞成也有否定。我也不认为我对警察具有特别的专门知识，但是，在报社内，我采访警察的时间长，因此，我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对警察或多或少有所了解的人。

在记者生活中，我记得我目睹了战后混乱时期和美军占领时期的警察、国会通过现行警察法时的混乱情况、一九六〇年修改安全条约的情况、一九七〇年围绕安全条约出现激烈动荡的情况、炸弹恐怖时代、东京先进国家最高首脑会议、搜查国际电讯电话公司事件以及搜查间谍事件等等。在采访中我渐渐认识到，让人们广泛了解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情，也是新闻记者的责任之一。

去年八月九日，是我五十五岁的生日。这一天，我到了退休年龄，但是，我被继续留用，当了编辑委员。我离开了常驻的警察厅记者俱乐部，从每天紧张地连续报道的工作中解放了出来，在时间上也有了富余，因此，我便产生了通过了解外国警察来重新认识日本警察的想法。我想，为研究警察迟早要进行一次全球性旅行。首先，我访问了汉城、布鲁塞尔和巴黎的警察。关于各国警察，通过文献我对它们的法制和犯罪情况有所了解。不过，通过短期访问，直接耳闻目睹，还清楚地认识到了迄今没有注意到的日本警察的一些情况。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

日本警察和日本的治安“是第一流的”。这似乎已经为外国所公认，我也认为确实如此。然而，判断各国警察优劣的尺度，是难以确定的，并不是因为外国报纸赞扬，就可以认为不错。警察也是在各国的历史和风土中产生、发展起来

的，能够对其作出判断的，只能是那个国家的主权者。我认为，警察属于主权者，因此必须在正确了解其实体的基础上，给予赞扬或批评，并加以监视，使之真正改善为为主权者服务的机关。这也是新闻记者的工作。

在欧美国家的大学中，举办有警察研究讲座，甚至还出版过许多关于日本警察的书籍。然而，日本对警察的研究，似乎是很不够的，学者们似乎还视这项研究为禁区。

经过对警察的长期观察，我认识到，对警察的研究不是单纯的法律学的研究。这也是我的结论之一。从学生时代起，我想学习以政治思想史为主的政治学，然而，我认为必须读但至今尚未读的有关书籍，至今仍堆在书库里。就这样，三十年过去了。没有想到的是，我成为新闻记者后则能不分昼夜地用一双记者的眼睛去现实地观察政治学的中心课题——警察这个权力集团，而不是通过文献去了解它。因此，与年轻时的想法相反，我感到能负责采访警察反而是一种幸运。

我在警察厅记者俱乐部工作的那段时期内，心中经常提出“警察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然后再作自我解答。随着长期深入观察，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了解；但老实说，对警察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我至今仍不甚了了。

美国总统的治安顾问、《市民与警察》一书的作者R·M·蒙鲍伊斯教授说：“开始思考警察是干什么的，便是认识警察的开端。”我感到，这种说法对我是一种安慰。

马克思曾经说：“警察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机器。”这种说法我无法接受。一些所谓进步的大学教授对警察提出批评，多数都是不了解真相，而是按其意识形态提出批评。

警察是社会制度的保卫者，但它的作用不仅仅限于这些，它还是建设更好的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种安全装置。究竟是否发挥了安全装置的机能？怎样才能既尊重人权又能更好地发挥其机能？这是今后我所关心的问题。

社会主义国家的警察权力大。在苏联，象萨哈罗夫博士那样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剥夺自由的例子并不罕见。在一段时期里，被日本驻北京记者美化为“清洁的”中国，最近也开始公开报道不断发生的行窃、打架斗殴、偷盗、拦路抢劫、强奸妇女等事件，“没有犯罪的社会”这种神话完全破产了。据说，北京作为防止犯罪的措施之一，曾让六千人列席对罪犯的公开审判，以便起到教育作用。意大利为连续发生恐怖活动而苦恼，制定了严厉的治安法。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犯罪的人比善良的人少，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考察少数人的犯罪，能了解现实社会的一个侧面。因此这是一种饶有兴味的工作。

与外国的情况相比，日本的治安是良好的。关于这一点，无须由外国报纸作出评论也是十分清楚的。在欧美国家，游客们必须时时提防小偷。在巴黎的饭店里，饮用水和啤酒价格相同。伊扎埃·本达桑在他的著作《犹太人与日本人》中写道：“日本人认为安全和水是可以免费得到的。”通过去欧洲旅行，我深深体会到日本的治安是好的。

拙著《日本警察的秘密》，在与警察打交道的人看来，也许称不上有什么秘密，莫如说是“公开的秘密”更为恰当。不过，我想其中还是或多或少地有普通人所不了解的警察的实际情况。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文献

上的材料，而是根据自己长期积累分类保存的采访笔记、旧日记，以及记忆中的当局有关的资料写成的。

在写作过程中，我认为我对所有政党、机关、团体、人物都尽可能地保持等距离，采取了忠实于资料的立场。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想给在我长期采访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向我提供重要消息的人带来麻烦。每当我想到这一点，那些亲切的面容就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常常放慢写作速度。我认为，要给同消息提供者下“密切接触”或“勾结在一起”的定义是困难的，二者之间只有毫厘之差。但关键恐怕在于论述的态度。如果害怕被人说成是“勾结在一起”而避免同材料提供者保持“密切接触”，那就无法了解到真实情况。如果能够因为我把普通人所不了解的警察的内幕公之于众，而使普通人或多或少地加深对警察的了解，那将使我喜出望外。

铃木卓郎
一九八〇年春

第一章 “世界第一”

——在光荣的背后

“世界第一”的日本警察

日本宣传机构一涉及警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也要非常苛刻地加以报道。如“警察在站岗时看电视了”，“署长在执勤时去过汽车教练所”。也许是因为战争中那可怕的印象仍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国民在内心深处仍“讨厌警察”。批评警察的书籍已出版了许多，日本的宣传机构对警察的评价是相当低的。与此相比，外国宣传机构对日本警察的评价则高得惊人。譬如，《纽约时报》（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刊登了该报特派记者采访东京新宿之夜后写的一篇很长的报道，其要点如下：

“在东京看不到有人在红灯时过马路，也没有人在地下铁车站的墙壁上乱写乱划。现在东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但是那里的犯罪率比任何一个城市都低。纽约发生的杀人案件，大约是日本的九倍。

“如果说原因何在，恐怕有以下几点：严格限制枪械、

凶器和毒品，而且警察的工作保证了这种限制起作用；在日本，历来就有尊重法律和权威的习惯，被逮捕这种事情对家属来说，是非常不光彩的。日本教育水平很高，失业率很低；人种、文化是单一的，事实上几乎不存在种族歧视的问题。

“欧美城市，在近十年里犯罪率增长了一倍多，但东京的犯罪率并没有增长，严重犯罪事件已减少。

“警视厅为了网罗最好的人材，从全国招收警察。市民怀着尊敬的心情，把警察叫做“奥麻瓦里桑”（巡警先生）。但是，一个当了三年的警察，每年的报酬才只有六千美元，而纽约的警察每年的报酬则是一万六千美元。

日本的警察很少动用手枪，这是因为使用武器的规定非常严格。”

平时在日本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外国记者却对此作了上述的评价。特别是其中不把日本的“交番”（派出所）一词译成POLICE BOX，而用罗马字写出这个词的日文发音KOBAN，而且，把“奥麻瓦里桑”（巡警先生）译成MR.WALKAROUND（巡视者），这是很有意思的。从上边的报道看，似乎可以说日本的警察比纽约的警察差的只是工资。我并不因为外国记者赞扬了日本警察，就说日本人对日本警察的看法错了。对日本警察，我也有自己的看法，但这只不过是我想从国际的角度为重新认识日本警察提供一点参考而已。

美国周刊杂志《新闻周刊》（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上载文说：

“日本是安全的，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安全。它具有使

西方发达国家的警察感到羡慕的岗亭制度。日本是世界上少有的安全国家，这是因为警察有RESPECT（令人尊敬）的品德和标志这种品德的TABS（领章即尊严的象征）。日本整个社会就是对犯罪的一种强有力的抑制力量。而且，日本自十六世纪以来的传统是，只有武士才可以带刀，对非法持枪械者有严厉的惩罚规定。发生犯罪事件时，只要按一下报警电话号码一一〇，三分钟以内，巡逻车就可赶到现场；如果报告了派出所，搜查人员也会立即赶到。日本人不分白天黑夜，可以到处自由地散步；丢失的现款等贵重物品能够物归原主，不会围绕钱的事情发生争执。”

另外，北卡罗莱纳州的《阿什维尔市民消息》报（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也刊登过一篇题为《安全城市——东京》的专题报道。欧美发达国家有影响的报纸发表的评论，并不是对什么都采取肯定态度的，其运用资料和进行观察也并非无的放矢。国外宣传机构特别对日本的警察及其治安情况的评论，比国内宣传机构好得多。这是确实的。但是，如果说日本是最安全的国家，便等于说日本警察优秀，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以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为主，由各国政府、财界、学术界、工人代表参加的，研究精神与环境问题的国际机关曾强调说：“越是国民收入高的发达国家，犯罪率越高。这是因为物质社会的高度发展，破坏了人们生存的价值。”尽管作为经济大国而闻名于世的日本的犯罪情况，有往欧美型大规模犯罪方向发展的趋势，但是一般还是保持在无增无减的状态，凶恶犯罪趋于略减。

根据警察厅《一九七九年犯罪情况》报告说，一九七〇

年逮捕的全部刑事犯为一百；一九七八年则只有一百零四；凶恶犯一九七〇年为一百，一九七八年则为七十六，处于减少的趋势。

国际政治学教授D·克拉茵吃惊地说：“如果看看日本的犯罪情况，那么不得不推翻迄今已使美国人感到悲观失望的一些学说。也就是说，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是犯罪和暴力的温床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从日本的历史来看，与其它国家一样，也发生过不少流血事件；而且，尽管日本电视涉及暴力的节目也不少，可是……”

日本既是个如此令人吃惊的经济大国，则又是个犯罪率低得令人吃惊的小国。关于“东洋的这种奥秘”，哈佛大学教授E·F·沃格尔在他著的《日本——世界第一》一书中强调了如下几点：即“市民能积极地向警察报告有关犯罪的情况”；“平时警察就和居民保持密切的联系”；“有关警察行动的一些纪律，比美国的严格得多。譬如，警察穿制服时，不能在警察署和派出所以外的地方吸烟和吃东西”。在日本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美国学者则为之感到吃惊。

福肯鲁教授还提出了“国民为何协助警察”这个问题，并自己作了回答：

“第一，警察的素质好，为执行职务富有献身精神。第二，派出所和地区、社会联系密切，深受市民的信赖。第三，日本人具有服从上级的传统。第四，在日本这个社会，个人是作为集体的一员而存在的，因而家庭和企业这种集体具有抑制个人犯罪的机能。第五，日本的警察为得到宣传机构和舆论的支持，总是谨慎地行动。”

日本人害怕“政府”，即体制的权威。这种情况的形成和日本长时期的历史、风俗有关，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是一种服从集体的美德，还是个人意志薄弱的落后表现？许多人对这点的看法未必一致。但是，正象沃格尔教授所说的，服从权威成了搞好治安的有利因素。

同样，人们对个人意志薄弱容易受到集体的抑制的看法恐怕也不尽相同。但应肯定，这一点对治安来说是有利因素。第一流企业的某干部，因儿子是激进派成员，与“浅间山庄”事件有关，辞去了领导职务。在日本，即使是个人犯罪，与其毫无关系的所属团体的领导人引咎辞职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的。但是，最近有百分之四十二的杀人事件是发生在自己家庭成员之间，因而令人感到传统的家族关系正在崩溃，家庭和地区控制犯罪的能力也在衰退。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不能对福肯鲁教授的赞扬感到放心的时代正在到来。

日本的治安情况良好，这点甚至使别的国家感到羡慕。但是这不仅仅是靠了警察的力量，而是与日本的风土和传统很有关系。从这种良好的环境中培养起来的日本人中选拔出来的警察是优秀的。

来日访问的纽约市市长林赛曾拜访过东京霞关的警察厅大楼。在到达四楼时，几个贴身警卫比市长先一步下了电梯，站在隐蔽处以锐利的目光扫视周围，在没有发出“安全”这一信号前，市长便站在电梯内一动不动。四楼有警察厅长官以及其他领导干部的办公室，应该说是最安全的地方。然而，就是在这里，如果贴身警卫一止步，市长也会连锁反应地停下来。其警惕性之高，令人吃惊。林赛市长对警察厅长官说：“日本警察不靠武器而制服犯罪，这简直是奇迹。”